

我的大学同学们

燕南 2018.3.15

一九五九年高考发榜时，我在漳浦乡下（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同学柯元和的家乡）调查老区老革命的事迹，打电话问妈妈，才知是分配到福建师范学院英语系。我第一个反应是：不去。不知天高地厚的我，高考前填第一志愿时，十四个选项，填的全是北大复旦这类重点学校的新闻系和中文系。谁知心高才浅，被安插在我想都没想过要读的英语系。后来，决定先去报到，再要求转系。走以前，一中一个老师曾说要我四块钱，后来没消息了。一个阿姨曾说要给我一个洗脸盆，也没消息。妈妈还是凑了一些钱给我，包括妈妈税务局的同事赵元玉给的二块钱，大姑婆也给了我六块钱。到了厦门，我买了一个不到一尺的小脸盆，购了一张五块多的火车慢车票，就到福州了。到站后，就听到大喇叭在播我的名字，原来是小学同学潘健飞（<http://yannan.us/growup/fuzhou/friends/jianfei/jianfei.htm>）来接我。健飞和我本是福建省烈军属子弟学校（<http://yannan.us/watery/fuzhou/elementary/ele-pic.htm>）的同学。他是军属，后来却因为他爸爸的历史问题（国民党时期当过县长），哥哥提前从部队里复员，健飞也考不上大学了。59年大学录取执行严格的阶级政策。我们高中（龙海一中59届）毕业班中家庭身份稍差的，很少被录取到好学校去。



到外语系后的第一件事是找到系里管学生的林启福老师，要求转到中文系。他说不行，我只好读英语了。我们这一届（59-63）的英语有两个班。我是63级英专A班，全班有20人，约一半是印尼侨生。这20人到了四年后毕业时少了7个人，其中一个转学，两个病退，四个被开除。被开除人中有原来的班长和团干部。这也差不多是我与共青团无缘的原因。

外语系位于仓前山麦园路11号。左上的照片于1959年国庆节摄于系门口（大标语的全文是“总路线万岁”）。上面就有我们班的几个同学。

跟我（照片后排右一）同宿舍的同学有董国麟（后排右二）、李少义、姚智荣和林韬（后排左一），各自占了一个双层床。董、姚都是印尼侨生。林韬来自马来西亚。李是厦门人，任班级的支部书记。隔壁的宿舍里住着李杏恩、黄文宗（前排中）、吴天雷，以及一年后被开除掉的班长（后排左二）和团宣教委员（前排左一）。

班长和团宣教委员所以被开除，是因为他们偷了几个侨生同学的物品。1960年是经济困难时期，大多数人都困难。班长来自闽西山区，宣教委员来自福州近郊的农村。看到侨生们好东西多，把持不住，动了邪念，被处理回乡，十分可惜。他们怎么偷，偷多少，合伙或单

干，怎么被发现的，我都不清楚。是智荣事后告诉我他们几个丢东西的失主如何配合团组织审问二人的，听说还出手打了。我听了心里有点难受。偷盗是应该处理，但应该交警方处理，不应该由同学审同学。（话说到了文革，同学打同学，同事斗同事就成了平常事了。）

吴天雷是个身体很棒而且很有个性的侨生。在收音机还不很多见的 60 年代，他买来一台约两米宽的交流电收音机，还擅自装了一个电炉。暑假，系里要求搬宿舍。他不搬，还动手打了系治安委员会的俄语系同学。引起众怒，他被劝退取消学籍，后来到南靖县县城当了电工。主管学生事务的林启福文革后期下放到同一个县城，还专门很有策略地去看望了他。

董国麟是很有趣的侨生。他风度翩翩，挂金丝眼镜，戴金戒指，吉他弹得很好。隔壁的吴天雷挂了一副美女图，国麟特地嘴唇涂上发油跑过去，大大咧咧地在美女像上面印上一个吻。回忆他的侨乡，他提到一个下雨天。他们几个男女同学去上学。路过一片水洼，倒影下看到女同学的裙底风光。但他实际上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一点也不轻浮。后来，他的父母也在排华潮中回国到广西，他就转系到广西的大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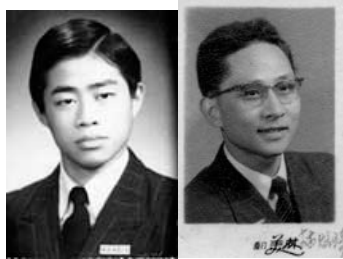
林韬是班上英语基础最好的。当入学时我们一些人（包括我）还在啃字母学音标时，他已经可以用英语对话了。他喜欢集邮，有很多世界各地的 pen-pal（笔友）。他还拥有一台当时罕见的袖珍式半导体收音机。不过，他学习没有我用功。他每个星期必看二部电影，我一学期都没看过一部。我的同学们周末都去参加舞会，我四年级去过一次。他学习也没有我得法。他手头有英语读物，没读，我借来读了。第一本简易英语读物是 David Copperfield（《大卫·科波菲尔》）。四五十年后在美国的车库拍卖中我看到有原著在卖，觉得倍加亲切，立即买了下来。他还有一本 Hornby 编的英英（英语解释英语）词典。他没用，我借来用，发现很好。几年后该词典在国内有卖时（所谓的影印本）我马上买了一本，受益无穷。姚智荣有一本俄国人写的英语语法书，我也借来看，并自己陆续地到东街口的旧书店买了许多语法书，很快提前过了英语语法关。那个时候中苏还没有交恶，苏联卖的书特别便宜。而原版书是既没有，也没有人买得起的，除非是上面提到的所谓的影印本，即盗版书。

除了一个人（见我的网页“[同学老夏](http://yannan.us/growup/fuzhou/college/col-Lao-Xia.htm)”：<http://yannan.us/growup/fuzhou/college/col-Lao-Xia.htm>），班上同学都对我很好。我虽然家穷，买鞋子还得申请补助，但不曾遭到歧视。在 60 年那个特殊的“瓜菜代”困难时期，我们这些“国内生”们沾了不少光--或者说不少油，不少粮。每逢郊游，或其他活动，都是侨生们出粮出油出钱。他们还给我华侨粮票，让我寄给妈妈和弟弟（结果妈妈还是买了饼干寄来福州给我）。我没有手表，杨耀华把她的闹钟借给我。我体质差，怕冷。吴天雷送给我一件夹克，李杏恩借给我一条毛毯。我一心想买一个打字机。东街口的旧货商店有一台 1920 年代出品的 Royal 牌的英文打字机，人民币七十块。我去看货看了好几次，妈妈变卖了几件家具，给我汇来四十块。杏恩借给我三十块。到毕业后我有了工资要还他钱，杏恩告诉我那三十块已经由黄文宗在毕业前夕悄悄代我还了（见<http://yannan.us/growup/fuzhou/friends/wenzong/wenzong.htm> [文宗箴英](#)）。



文宗是厦门人，文娱委员。五十五年过去，每当我听到《草原之夜》这首歌，我就想到文宗当年唱这首歌的男中音。文宗和箴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给了我很大帮助。他们毕业当天就结了婚（左图摄于外语系大楼，他们结婚当天），并都分配在福州。因为我分配在函授广播学校（教育学院内），因此我们常见面。他们的两个女儿的名字也是我查辞典给取的。

我的 1920 年代 Royal 英文打字机跟了我二十多年，从没有坏过。我常用，还常给它拆洗加油。有一个部件本来不灵，后来也让我修复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我以英语研究生身份从教育部申请到一台英文打字机的进口免税额度，我在香港的另一个同学林璨崎才给我买了一台新的。英文打字是我一入学就决定学的。五九年国庆大庆的五天假期，我向一个老师借到一架二十年代的英文打字机，一连五天，从早到晚，我坐在我的书桌前学打字，严格的十指指法，touch type。带子打不出颜色了，用煤油沾沾，继续用。后来，打字机带都有破洞了，就去买了复写纸，垫着打。拜伦、雪莱、济慈的英文诗，我就是这样一首首打到我的活页纸上的。四十年后我初到美国，想寻求一份工作。无论英语试题或测键盘打字，我都是一通就过的。



林璨崎跟我不同班，但跟我很要好。他不仅像董国麟一样风度翩翩，而且常年西装革履。他从香港来，拥有全套的莎士比亚文集，还曾经在晚会上朗诵莎氏的作品。毕业前夕，他让我穿上他的西装，打上领带，一道去相馆拍了毕业文凭用的照片(左边为我和他)。然后我们俩西装革履跑到我们毕业实习的学校福高(福州高级中学)拍照。认识的老师用怪异的眼光看我们这两个不谙世道的大学生。是的，我们在政治气氛相对宽松的校园里读大学，但现在政治风声开始收紧，又在讲革命化了。幸好，我们捡到四年相对安静的读书机会。这一下要离开温馨的校园，踏入风声鹤唳的“革命”社会了。两班毕业生中，只有我没有分配到中学。后来(15年后)，也只有我考了研究生。璨崎分配到龙岩。改革开放后才回到厦门。后来也去香港了。其他侨生们后来也大都出境了。



李杏恩原来是我们的学习委员，但没读到毕业。三年级时例行体检发现他原来染有传染病，立即把他送去福州西门外的传染病院了。系里十分紧张，让我们全部同学男男女女脱光衣服重新体检，看有否受到传染。(结果没人受到传染。)同学们对他很生气。他离开时没有人送他。只有我把他送到系门口。我同情他：有那种病谁敢说呢？另外，他有恩于我，借给我毛毯和买打字机的钱。病治好，他也去了香港。1982 年间他给我寄了左边这张照片，上书：友谊常存。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厦门大学教书了。



左边是我们那一届的毕业照。13 个人中产生了三对夫妇：文宗和箴英(分配在福州，后来去了香港)，耀华和智荣(分配在泉州，后来也去了香港)，少义和淑英(分配在莆田，后来回到厦门)。



1981年，移居香港的文宗与箴英回来与在厦门的同学和家属聚会
 (后排) 黄文宗、庄燕南、林韬、李少义
 (第二排) 黄箴英 (左二)、张丽卿 (左三)、黄淑英 (左五)

1982 年间，文宗和箴英从香港来厦门主持一家香港贸易公司。我们三对在厦门的同学和家属在一起拍了左边这张照片。



1995年燕南和丽卿回国探亲，在香港机场与在港的同学相会。

我 1988 年来美国。两年后丽卿也来到我身旁。后来两个孩子也到了。1995 年，我与丽卿回国经过香港时，与在港的同学们在启德机场合影。